

文学批评家丛书

人·生活·文学

王愚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贵仁

封面设计：姚正选

版式设计：徐秦生

人·生活·文学（文学批评家丛书）王愚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 插页 277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统一书号：10094·726 定价：2.55元



目 录

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代序）	（ 1 ）
艺术形象的个性化	（ 13 ）
艺术形象的个性化再探	（ 23 ）
典型的个性化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问题	（ 40 ）
论阶级和典型	（ 45 ）
论典型化手法的多样性	（ 59 ）
现实主义的厄运及其教训	（ 73 ）
艺术真实是认识了的生活真实	（ 86 ）
浪漫主义 文学园地里一朵奇葩	（ 100 ）
创作上有所突破的前提——“真”而“深”	（ 113 ）
站在时代的高度看生活	（ 123 ）
关于文学的现代化和现代派文学	（ 128 ）
关于文学的时代观念	（ 144 ）
积极反映时代生活的历史特点	（ 149 ）
用新的方式看周围世界	（ 158 ）
历史意识的强化与小说内容的深厚	（ 165 ）
——从一个侧面看新时期小说的发展	
文学在较深层次上的开拓	（ 173 ）
从历史运动中把握现实	（ 179 ）

探索民族精神的衍化·····	(185)
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	(195)
从人性说开去·····	(203)
谈当前创作中的道德观·····	(215)
改革的人与人的改革·····	(220)
关于西部文艺的沉思·····	(230)
战争题材演变的新趋势·····	(285)

读两部战争题材小说新作

准确把握当代青年的精神历程·····	(243)
为一代新人塑像·····	(247)
谈近年来短篇小说的现状与发展·····	(254)
在多样化的面前·····	(275)
谈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	(281)
贾平凹创作中的新变化·····	(294)

——《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

他从狭窄的境地里走出来·····	(301)
于平凡中见真美·····	(312)
捕捉历史之魂·····	(320)

——谈矫健在《河魂》中的追求

大千世界缩微·····	(325)
-------------	---------

——张辛欣新作《封·片·连》读后

读《一夕三逝》随感·····	(328)
“昆仑之火”在他们心中燃起·····	(331)

——《啊，昆仑山！》读后

从一个角落看时代·····	(334)
奇不失真·····	(338)

开拓工人生活的内蕴..... (349)

知音其难哉..... (359)

[附录]

必须从文学实际出发..... (374)

后记..... (391)

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代序）

——我和文学评论

我从来也没有计算过，在文学评论这个行当里究竟干了多少年。今年我的一本文学评论选集出版了，选了我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各个阶段散见于报刊的评论文章，掐指一算，一九五五年我在上海《文学月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谈赵树理（三里湾）中的人物描写》，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生也有涯”，三十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但这样一计算，不仅没有欣然于怀，反而觉得忧心忡忡。本来，一个人在文学评论园地里苦苦耕耘，历经三十年风雨，到今天，以半百之年，衰病之身，还在对当代文学发表着或正确或谬误、或深刻或肤浅的议论，说句大言不惭的话，也算得上无愧于心了。尤其在当今文苑中，重创作轻评论，已经成为风气，就是在搞文学理论研究的圈子里，重理论探讨，轻文学批评；重古代现代，轻当代评论的看法，也早已有之。我还是满怀深情地注意着当代文

学的走向，以自己微薄的能力，浅薄的认识，评鹭得失，披流寻源，写出一些也许并不为人看重的评论文章。甚至为此牺牲了不少可以闲步庭院，流连视听的业余时间，让别人看起来，不免有些难以理解。

然而，再往深处一想，三十年过去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文章写了不少，求其对世道人心有所补益，对文学流变有所建树的真知灼见，实在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可以垂之后昆，百代之下还能起到一点作用的传世之作了。三十年，在历史递嬗中，并不算长；在人生旅途中，也不算短，语云：“三十而立”，我从教学评论三十年，究竟“立”了呢？每念及此，不禁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慨叹。虽然，我至今笔耕不辍，也还有刊物愿意发表我的文章，但我总觉得，从事文学评论，实在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不过，慨叹归慨叹，我终于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直到今天还在艰苦地爬坡，也并非毫无来由。

说是职业的需要，也未尝不可。解放以前，我只是个高中学生，虽然在校学习时，由于家庭熏陶，对国文有所偏爱，但那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选择文人这个职业，根本不可能，所以高中毕业，我考大学时就报的是医学院而不是文学系，觉得救人性命比舞文弄墨要实在得多。解放后，象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满怀革命热情，踏进西北军政大学的大门，当时从心底里感到，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从军从政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比写点文章、搞点宣传，要高尚得多。但后来组织上出于革命需要，分配我到艺术学院去学习，偏偏又分到文学系，从此和文学沾上了边。但当时向往的是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对文学评论，说句不恭敬的话，是不屑一顾的，觉得那是创作的附庸。

五十年代初，提前分配工作，我搞过曲艺创作，搞过戏剧改，革就是没有搞过文学批评。

出乎意料，当我精力旺盛之年，却身患重病，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四、五年，病中寂寞，借读书以自娱，读多了，发现有些书感动了我，有些书就不太感动我，有些书甚至引起我的反感。为了弄清个中因由，便又找了几本文艺理论书阅读，想从其中寻求答案，以启愚蒙。记得当时就有苏联季莫非叶夫的《文学基本原理》、巴人的《文学论稿》、蔡仪的《新美学》。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原来文学并不仅仅是消遣解闷的闲书，而是对人生的探索，对社会的感应，其中有深刻的含意在。又因为这些理论书籍中都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引用的也多是马、列名著中的词句。我又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论著，翻阅的多了，有了一些比较，我又发现当时文学理论书籍中的理论，有些能说服我，有些并不能说服我，他们之间也各有不同，我便随手记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待到病情稍轻，重看我那些断片零简，觉得还有点自己的意见，便连缀起来，写成文章，寄给一些文艺刊物，起初当然以退稿居多，后来也有发表了，甚至还有一些对我的文章中的观点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文章发表，这就进一步引起了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兴趣，而且觉得，文学作品是那么多，在人们阅读中，肯定也会有人和我一样，需要进一步思索，这时，文学批评将会给人们以帮助。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公之于众，既能引起人们对文学的进一步理解，也会在辩难中提高我自己的阅读和欣赏水平，于是便继续写了下去。可以说，我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路，完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见解，至于这些见解是不是合乎一定的规范，合乎一般的看

法，没有多考虑。至今我还遵从这个原则。

时隔不久，我的病情有所好转，当时西安的《延河》月刊缺一名理论编辑，编辑部的同志发现了我，便力邀我去编辑部工作。到编辑部后，由于工作关系，不能不执笔为文，当时编辑部的领导也颇鼓励年轻的编辑勤于动手，尤其作协机关的领导，象已故的柳青同志，就常常说，一个编辑部必须出成果、出人才，成果就是见诸版面的作品，人才就是编辑能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家。在这种气氛之下，我也就不揣浅陋，不断撰写文学评论文章，也力求写得有点见解，有点作用。这样看，我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始非所料，继而为职业所限，也可以说是工作需要吧！

但是，如果说单纯是为了职业，却也不尽然。大约在编辑部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反右斗争就开始了，在当时那种扩大化的氛围中，我又经常在文章中，在口头上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特别是读文学书籍多了，又不愿意人云亦云，不愿意听从我自认为并不准确，或并不正确的理论指导，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从此，开始了我二十年的坎坷行程，以羸弱之躯，在农村干重体力劳动，而且还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之下；以痛残之体，被轮番批斗，而且还要饱以老拳；以宿疾之体，被关进监狱，而且挖土制砖，筋疲力尽。至于家中被抄，妻儿受累，更是揪心的痛苦。历经坎坷之时，几乎无时不提到我以写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幸喜“四害”翦灭，冤案昭雪，我才重见天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样沉痛的教训，我本应记取在心，从此洁身自好，再不去搞文学评论。俗话说，一朝被蛇咬，三朝怕井绳，更何况我因撰文获谴，足足二十年不能翻身，又何

必重操旧业，再蹈孽海。我想，当时如果我向组织上提出不再搞文学评论，或者干脆不再干文学工作，以我二十年受到的磨难，领导上也是会给以谅解加以照顾的。但我不仅又回到理论编辑这个行当里来，而且又执笔为文，旧习不改，对当代的文学创作评头论足，说短道长。看来，仅仅从职业的性质着眼，又不是那么准确，也未必全面。

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我对文学的爱，对文学事业的爱。这种话，听来十分一般，但当一个人从文学中找到慰藉，找到力量，甚至在沉沦底层、陷身囹圄，遭到许多人白眼时，他在文学中，体味到人生的美好、奋争的激情和温馨的爱抚，他要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自己的至爱亲朋，周围挚友，甚至想要更多的人与自己同感，这就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一种炽热的眷恋。所以虽遭大难，我至今仍然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匍匐。最初，我爱上文学，主要是家庭环境。我的父亲虽是半生从戎，但他对文人的向往，愈到晚年愈强烈，藏书成为他一大嗜好。所以，从我懂事开始，就和书籍为伴，加上我是独子，没有多少嬉戏的伙伴，书便成为我渡过空闲时间的唯一伴侣。那时几乎什么书都读，从古文诗词到杂记随笔，从先秦诸子到鲁迅、茅盾，久而久之，涉猎渐深，我在文学中发现了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因此，我爱上了文学，我希望文学能长久滋润人们的心田，铸炼人们的灵魂，陶冶人们的情操，共同走向真诚、善良、美好的境界。这样一种对文学的爱，已经变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在“文革”中，我被关进监狱，完全与文学隔绝，我也没有丧失对文学的兴趣。找不到书看，就回忆过去读过的书。时至今日，我虽然别无所长，但读文学作品，似乎已经成为习惯。有人以为，评论家都是极其冷酷的人，喜欢吹

毛求疵，搜寻弊病，其实就我自身的经验看，我所以在文学评论这个行当里乐此不疲，根源在于我对文学的爱。现在看来，单纯从对文学的挚爱出发，也许对文学评论这样庄严的事业有点褻渎，至少也是不够庄重。但我总以为，缺乏对文学事业的爱，很难写出声情并茂的评论文章。从五十年代后期（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点）开始，不少文学评论摆开大批判架式，好象和作家天生是对头，结果成为读者厌烦，作家畏惧的一纸判决，甚至从批判的武器过渡到武器的批判，深文周纳，致人死地，那更是文学批评的末路。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位贫病交加的俄罗斯伟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当年我在辗转病榻的时候，就因为看到满涛同志翻译的（顺便提及，满涛同志的译文是否准确，我不懂俄文，无从置喙，但文章的丰神，文章的激情至今仍令人叹服）。《别林斯基选集》，才有兴趣走到文学评论这条路上来。论嫉恶如仇的精神，别林斯基对颂扬沙皇统治的宫廷文人的斥责，对模仿西欧的平庸作家的厌恶，真是溢于言表、声色俱厉。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挚爱之情，他为许多作家受到当时不公正的批评而奋笔直言，在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几乎渗透在每一行、每一页之间。我又想起我们视为先哲的鲁迅先生，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精神，他那痛打落水狗的战斗意气，他那对一些浅薄批评家的热潮冷讽，至今也还没有失掉生命力。但他对年轻作家的奖掖，他对新生文学的热爱，他要求批评家具有剜烂苹果精神的期望，真是先辈风范，尊者气魄，又何尝有一点尖酸刻薄呢？所以说，有了对文学，对文学事业，对文学家的挚爱，未必能当一个见解深刻、眼光犀利、笔锋恣肆的批评家，但缺乏这种爱，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批评家。也许我在这一点上认识有偏颇，但我

是信守这一条并且始终不渝的。五十年代，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围攻，我作为省级综合性文学月刊《延河》的编辑，完全可以不必搅合进去，何况有些批评文章已隐隐有挞伐之音。但我本着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真实反映生活的喜悦，决定写一篇文章，而且就在自己当编辑的杂志上发表，尽管文章并不十分成熟，但在当时情况下，仍然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周扬同志甚至极力推荐，可见，没有对文学事业的爱，就不会有批评文学的胆识。当我从二十年的坎坷处境中走了出来，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我也正是怀着对文学事业的爱，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事业的蓬勃兴旺、多姿多彩欢欣鼓舞，重新拿起笔来，自愿为新时期的文学鸣锣开道。大约从1980年起，我写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力图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为新时期的文学能直面人生，摒弃谎言；勇于探索，不落旧套；视野开阔，不拘一格而呐喊呼唤。我没有多少颠扑不破的真理之言，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远见卓识，尽管有些人认为我这样的文章缺乏新颖的知识和深奥的理论，但我以为，只要通过我的文章，能使读者诸君感到当前文学的氤氲和气势，进一步关心这个事业，从中汲取应有的教益，也就于愿足矣！

当然，光凭感性上的爱，并不能正确估价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价值和弱点，而做不到这一点，文学批评的存在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说句老实话，文学园地里尽管百花争艳，但也不可能没有杂草丛生。从作家本身来看，大概没有一个人自愿在文学园地中制造荒芜景象，但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审视现实的程度、审美情趣的陶冶、适应读者的选择、观察社会的广度，写作时的心境，诸如此类，都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尽管

有人把作家看得如何超凡入圣、不食烟火，他总归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的一员，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古代有所谓“山林隐逸”，且不说那些“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沽名钓誉之辈，真的逃世是不可能的，庄子虽然大声疾呼“未若相忘于江湖”，但他还奔走于君主之间，还得要去作漆圆吏，恐怕也是不能完全忘世的。一部《南华经》，对人情世态看得那么透彻，岂是一个逃世的人所能做到的。更何况，现在的时代，人类的创造精神不断发扬，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向自然进军的深度、广度前所未有，人类的触须已经不限于地球，而是伸向了茫茫的宇宙，想躲开纷繁的现实，寻找极乐的净土，不过是幻想而已。因此，作家的创作必然要受制于历史的、社会的诸种因素。这时，就需要文学批评家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人们审美意识的发展，去评析作家的创造，看看这种创造的价值何在，对人类的进步是有益还是无益，是创造审美的读者，还是降低读者的审美水平。我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走到文学评论的行列里来。尽管比起历史上伟大的理论家和当代有成就的批评家，我不过是一抔黄土，限于自身的才思和所处的生活学习条件，读了许多书，所得者甚少，这是至今还引以为憾事的，常常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苦恼，感到文学评论虽不为人重视，在我却仍然是十分艰辛的事业。如果说现在我还有一点知识积累的话，那也是因为我杂学旁收，并不仅限于读文学作品，而是广泛涉猎以求视野的开阔，我读哲学、历史、经济学、心理学，甚至一些观光旅游的游记、描绘风光的散文，也加以浏览。特别是能提升自己思维能力、指导自己进一步把握历史和生活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能在纷纭的文学现象中，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

当然，我的读书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甚至是以个人的痛苦为代价。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离开了编辑岗位，后来又因病调回机关，政治问题没有解决，自然不能去做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上安排我管资料室，开始我还有点怨气，后来面对那浩瀚的书籍海洋，才找到了最好的寄托，老老实实读了一些书，比较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时，我不仅打开了眼界，知道人类的创造精神可以在更深、更广的领域里纵横驰骋，而且通过学习，知道了平常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有那么多隐情，在我们身边之外，有那么广袤的天地，懂得了简单地把文学看成政治工具和道德训诫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对文学本身的限制，但文学也确实不是富人膝下的叭儿狗，闲适之辈的小摆设，庸俗之徒的消遣品，它要为一代人的精神灵魂写照，要给弱者以力量，给豪强以抨击，要净化人的情操，充实人的头脑。我就这样在书籍中渡过了整整两年。时间虽然不长，却为我以后认真读书，刻苦学习，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打下了基础。我在此后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尽管未必有什么新发现，却总是力图从文学在把握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上，从文学怎样通过现实生活发展对人们内心世界的触动和渗透上，从文学怎样最大限度适应时代的审美意识上去评价作品，论述作家。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文艺气候之下，且不要说我一个摘帽右派，注定是不能问津于革命的上层建筑，那种单纯把文艺作品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和路线斗争工具的高论，我也的确无法适应。因此，整个六十年代，我几乎很少写什么东西。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我和文学的关系，就仅限于写无休无止的检讨了。

只有在粉碎“四人帮”后，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有条件把我对文学的想法公之于世。因此，从1979年，

我刚刚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当我看到象《班主任》、《伤痕》这样的作品，冲开极左思潮对人们精神的束缚，抒写人们长期以来灵魂上受到的压抑，便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为之鼓吹呐喊，特别是当时有些人对这些作品颇有非议，我很不以为然，极力维护这种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感，在艺术上不尚藻饰的作品和文学现象。平反之后，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从一篇描写极左路线对普通工人家庭种种迫害景况的小说，谈到“伤痕”文学之必然产生和应该存在，尽管现在看来，相当粗疏，但能为真实而真诚的文学鼓吹，在我是莫大的欣慰。也由此想到，文学评论之所以需要，似乎并不完全在于对美文的鉴赏，对韵味的品评，特别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生活急剧变化的时刻，需要的是呐喊，是奋争，是冲决，是向往，是对文学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作用作出的肯定和否定；吟味风月，流连神韵，不免显得纤弱，和人民的审美情调未必和谐。后来，我看到有些评论家，对一些锐气十足，敢于揭示生活中尖锐矛盾的作品，大声疾呼，充分肯定，表现了他们的勇气和胆识，我虽不才，也极力追随他们之后，为文学作品能具有蓬勃的生气，活泼的锐气，能和时代生活贴紧，与时代精神感应，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从审美上加以评议；为新时期的作家能具有高度的时代使命和敏锐的生活感受而鼓吹。也许这样做，有过分偏爱文学的社会功能之嫌，但是，文学在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不能引发人们对自身、对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不能触动人们对周围世界强烈的感情，恐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审美情趣为什么代代不同，为什么不断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历史的运动，时代的发展。这种认识，也许并不那么深奥，但却是我在困顿之境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学习和阅历，对文学评论的

理解。我不仅在理智上按照这样的理解去从事文学评论，也是充满着激情去维护这样的理解。在我自己，也正是有这样一个理解，才不计得失，直到现在还全力以赴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可惜的是，我的学力和识见都有欠缺和肤浅之处，没有写出有价值有水平的文章。我深知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它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广阔的艺术视野，细致的审美感受，比起创作来，并不轻松愉快，我常常为自己缺乏这些方面的修养和才能，感到十分吃力，自己的文章在写作时信心十足，发表后懊丧不已，总觉得水平不高，文思涩滞。自己好象总是在不断的爬坡，无休无止，真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尤其是近年来，文学评论的方法更新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年轻有为的评论家，脱颖而出，以他们对西方美学理论和艺术哲学的知识、对陈旧传统的摒弃，对新的文学现象的敏感，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和充满朝气的文章，象我这样在传统的路子上走得较久的人，一下子确实有适应不了的感觉，不免有些惶惑和惘然。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苦恼，使我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许多新的命题，对这些命题反复思考，并且不断作出新的抉择，重新认识自己走过的路子，一方面认真学习，扩大知识视野，一方面认真总结自己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只有在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相当薄弱，对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剖析和判断，缺乏一定的理论高度和分析深度。比如关于文学的审美功能，关于文学的文化内涵，现在似乎是引人注目的领域，好象过去没有人朝这方面思考，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文学现象的审美观照，他们对人类审美感情的精湛研究，至今还是我们在美学领域分析许多复杂现象时所没有达到的；而由马克思、恩